

东北亚地区主义语境下的中美关系

刘永涛

摘要 冷战结束以来,东北亚地区主义进程逐渐成为引人关注的话题。本文把中美关系放在这一语境下加以探讨,试图说明这种地区主义进程对中美关系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了东北亚地区主义进程在安全政治领域所处的现实环境,提出东北亚和平与安全面临潜在威胁的两类来源。本文还对影响东北亚地区主义进程的不同文化及不同安全合作模式进行了探讨,通过对中国“新外交”思想的理解,指出中国在对美关系过程中为推进东北亚地区主义进程所做出的努力。

关键词 东北亚 安全地区主义 中国“新外交”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65-4812 (2008) 03-0044-50

近年来,有关东北亚地区主义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并在理论和经验上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1]把中美关系与东北亚地区主义进程联系起来加以看待和分析,旨在把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置于国际结构中的地区层面加以把握。

谈论东北亚地区主义,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该地区各国之间在经贸领域彼此相互依存的情形。的确,这一进程在经贸领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令人鼓舞。这不仅在于经济本身具有基础性和重要性,而且在于国家之间往往更易于在经济领域达成共识和分享利益。不过,如果把东北亚地区主义看作是一个呈开放特征的综合性进程,那么,它并不局限于实现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上,它还应该包括旨在改善该地区各国之间在政治关系及确保共同安全方面的合作努力。事实上,东北亚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及安全彼此密切联系,它们共同规定并影响着地区主义作为一种进程在该地区的实践和发展。^[2]

那么,东北亚地区主义进程对传统上的国家之间双边关系意味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情形?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本文选择中美关系作为一个例子,把它放在东北亚地区主义——侧重于放在东北亚地区主义的安全领域——语境下加以考察,分析东北亚安全地区主义进程的现状,并探讨中国在参与该进程的过程中,如何以“新外交”理念及“新安全”观作为指导,调整中美之间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政治关系。

本文首先理解“地区主义”在概念上的基本含义,以及安全地区主义进程在东北亚所处的环境,认为东北亚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历史创伤,使得东北亚地区主义进程在安全政治领域既令人渴望,也步履艰难。本文随后对可能影响东北亚安全地区主义方向和秩序的两个因素加以探讨。一是该地区所存在着的不同文化;另一个是该地区的传统安全合作模式。最后,本文分析中国如何在“新外交”理念和“新安全”观指导下,重新看待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以此作为理解中国在推进东北亚安全地区主义进程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如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概念一样,“地区主义”被人们赋予多种不同的含义。一种定义把重点放在地区主义的动态特征上,认为它指“特定地区的诸国家和其它行为体之间,在政

治和/或经济方面不断强化的合作过程”。^[3] 另一种定义则注重地区主义的观念特征（这也是所有的“主义”所具有的特征），把它视为某个地区各种行为体所分享的一种意识形态。^[4] 还有一种是把地区主义进行广义和狭义区分。广义上的地区主义是指“特定地区内的国家政府、地方政府、组织机构、非政府组织、民间和个人推动地区范围内的合作形成的相近或共同的态度、主张、战略与政策以及具体的实践活动的总和”；狭义上的地区主义是指“国家政府之间”为倡导和促进地区团结而“形成的共同战略与政策”。^[5] 地区主义可以涉及到不同领域。就安全地区主义而言，它可理解为特定地区诸国家（以及其它行为体）之间在安全政治领域日益强化的合作与协调过程。

地区是一个空间概念，涉及到地理上的邻近、互动的密切程度、分享的机构网络、共同的文化身份等。地区还可以从经验上确定为“彼此依赖的互动，譬如贸易流量、行为体在特征上的相似性，以及分享的价值和经历”。^[6] 根据这种理解，东北亚安全地区主义可以主要指这些国家——韩国、朝鲜、日本、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之间从观念和实践上在安全政治领域进行不断强化的合作及协调过程。上述的前四个国家在地缘上彼此接近，构成东北亚地区的主体。俄罗斯的首都位于欧洲，但这个国家的远东及西伯利亚东部在地理上位于东北亚。美国在地理上远离该地区，但是在诸多方面深深地卷入其中，因此被认为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行为体。

就安全政治而言，东北亚大体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该地区聚集着实力程度不同的大国（譬如唯一的超级大国、全球性大国、以及地区强国）。第二，该地区存在着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譬如自由民主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在世界上正式宣布拥有核武器的七个国家中，有三个处于该地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而且存在着谋求和/有能力发展核力量的潜在国家。第四，从一定程度上讲，东北亚的近现代历史是由战争和冲突、殖民和被殖民、入侵和抵抗、占领和分离所书写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东北亚各国人民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战争及暴力的受害者。此外，尽管冷战结束已经十多年，但有两个冷战遗产（分裂的中国和分裂的朝鲜半岛）仍然存在于东北亚，并构成影响该地区安全政治的突出难题。

尽管东北亚经历了十多年的相对和平时期，^[7] 但是，冷战后的东北亚仍旧是一个不安全和存在潜在危险的地区。对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的不安全文化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物质（或硬的）方面难题，譬如不断的领土和海域之争、^[8] 恐怖主义和/或分裂主义、军备竞赛以及潜在的核扩散。另一类是非物质（或软的）方面难题，包括在有关“历史”叙述方面的不断分歧、不同的集体/大众记忆（以及个别国家对“历史忘却”的建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之间在安全上的相互猜疑和缺乏信任。这些难题不同程度地表现在该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之间。这两类不安全文化来源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彼此作用，彼此构成。譬如，在“历史”叙述、集体记忆/忘却、领土争端以及民族主义之间，它们存在着相互构成的联系。国家之间因历史恩怨所造成的相互猜疑甚至偏见，经常流露于社会不同层面的政治话语中。在经过操纵和渲染的话语作用下，猜疑和偏见转换成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过来，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煽动了“历史”争端，并加深公众在集体记忆/忘却上的分歧，从而使这类争端和记忆/忘却经过话语作用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不断被建构。通过反复叙述过去的遭遇，集体记忆能够制造出一种受害者综合症，并以此作为“加强集体凝聚力的一种方式”；^[9] 类似地，通过不断强调过去所取得的成就，集体记忆可以鼓励“一种自豪感”、“士气”和“优越感”。^[10] 对历史事实的刻意抹杀和忘却，则被认为是对所犯下的历史罪过拒绝承认和清算。

从目前来看,软难题显得给东北亚安全地区主义进程造成更大的挑战。如果说硬难题可以通过外交或对话的途径加以解决,或者搁置下来留给后人的智慧去处理,那么,软难题则经常冒出来。它们涉及民族身份和大众情感,而且易于受到不同话语的操纵而被政治化。因此,东北亚各国所面临的“共同敌人”,与其说是来自该地区以外的威胁,还不如说是来自该地区内部的挑战。不同的“历史”叙述和集体记忆/忘却,对东北亚地区长期和平与稳定构成主要障碍。因此,能否正视历史和超越历史成为影响东北亚安全政治的重要方面。记住历史是重要的,那是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原谅”历史同样重要,那是为了朝向更好的未来。21世纪东北亚的长期和平与稳定,需要更多地朝前看,而不是朝后看。

在这种环境下,对东北亚的安全政治进行社会建构,成为一种令人渴望的事情。尽管东北亚尚缺乏正式的地区安全多边机制,但是,冷战结束以来,人们设想建立这类机制的热情和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尽管东北亚地区主义进程在安全领域仍然步履艰难,甚至有些模糊不清,但是,它正在成为一种更可想象、更可期待的东西。

二

冷战结束以来,东北亚地区主义逐渐成为引人关注的话题。然而,由于该地区存在着如前所述的诸种复杂性和独特性,这一进程在安全政治领域并非容易,本文在此仅提出两个相关因素,它们对东北亚安全地区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地区秩序可能构成影响。一个是文化上的因素,即在该地区共存着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另一个是安全合作模式因素,即该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以双边安全联盟为主的安全合作模式,而且这种模式至今在该地区的安全理念及实践上仍然占有突出地位。

东北亚地区受不同文化和身份的影响。(由中国、韩国、日本以及朝鲜所体现的)东方文化和(主要由美国以及部分地由俄罗斯所体现的)西方文化共存于东北亚,使该地区从根本上缺乏分享的文化和共同价值基础。^[1]它使得一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即谁的文化用于指导和确定东北亚地区主义进程在安全政治领域的方向。当然,文化不是固定的,而是在社会实践和人类经历的过程中所形成,并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演变。因此,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地区安全机构或机制的建构过程,会把东北亚诸文化重新融入到更为广泛、得到普遍接受的合作性安全关系中,这种合作性的安全关系被认为是维持该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不清楚的是,东北亚安全地区主义是否能够超越这些不同的文化。还是说,这种令人渴望的地区安全机构或机制本身,在不同文化的作用下而陷入分裂,甚至在该地区出现不同的安全机制,形成机制之间的相互竞争和争斗。

影响东北亚安全地区主义进程的另一个因素是传统的安全合作模式——双边安全联盟。在冷战的环境里,几乎所有的东北亚国家,在一定的时期、以不同的程度,通过与另一个国家缔结双边战略/军事联系的途径,谋求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利益,譬如日美联盟、韩美联盟、中苏联盟、中朝联盟以及后来旨在制约苏联的中美战略关系。所有的联盟国家通过承诺在军事上的相互责任和义务,威胁和/或威慑它们的(潜在)对手,以便捍卫和确保自身的安全。这种安全合作模式在东北亚得到广泛的实践,并被认为在维护冷战时期该地区安全稳定方面起到作用。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其中的一些联盟关系仍然保留下来,甚至有所加强和进一步制度化。

然而,这种传统的安全合作模式不断面临着挑战。一方面,作为冷战环境下权力均势政治的副产品,该模式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它的封闭性和双边性。它试图通过使诸国家之间物

质实力分配平衡的方式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过,建立在物质实力平衡基础上的稳定有可能是不确定、不持久的,因为所有的物质实力不会是静态的,而是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尽管后冷战双边安全联盟在改善盟国之间安全/战略关系方面有所帮助,使它们分享更多的安全期待和行为,但是,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这种建立在双边基础上、具有封闭和排它性质的安全合作模式,几乎难以改变这样一种情形,即作为“自我”的盟国和作为“其它者”的非盟国之间彼此存在着潜在猜疑和对抗。在现存的安全秩序安排下,难以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东北亚再度陷入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大国竞争,其特征为对抗、紧张、威慑和反威慑,或者说,该地区诸国家再次求助于谋求建立和加强双边军事联盟,通过做好随时采取暴力行动的准备去保存自己的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这种传统的安全合作模式难以给东北亚整个安全保障提供“公共产品”。自1990年代以来,东北亚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该地区不安全及危险的来源也在发生变化:主要的冷战威胁已经消失(尽管遗留下两个冷战遗产),而其它(诸如核扩散)和非传统安全难题,逐渐成为威胁整个地区安全的新来源。传统的安全联盟模式——由于它的排他性和双边性——难以应对这类诸国面临的多边挑战,^[12]甚至不愿意为该地区的整个安全保障提供“资源”。

为了应对已经发生变化并正在继续发生变化的安全环境,在东北亚各国之间建构一种新型的安全合作模式成为必要。作为一种制度或机制,东北亚安全地区主义将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上的安全合作模式。它是一种合作性的安全体系,在性质上呈开放性和多边性。以安全地区主义作为基础的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有可能会更加持久,因为它是建立在各国彼此平等对待,相互信任,分享规范和集体身份的基础上。的确,东北亚安全地区主义进程已经给一些国家之间的安全政治关系带来影响。就中美关系而言,在东北亚地区主义语境下,两国之间的安全政治关系正在发生若干变化。反过来,这些变化推动着东北亚地区主义进程的发展。

三

随着冷战结束,中国与东北亚所有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说地区主义在当时中国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那么,这种情形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发生转变,其原因部分在于中国与其它国家一起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积极进行着谈判。此外,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从这个时期开始在对外政策思维方面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调整,提出“新外交”理念,其指导原则包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谋求和平,搁置争议,避免冲突和加强多边沟通与合作;保持与大国(尤其与美国)的稳定关系。^[13]

与此同时,中国还倡导“新安全”观,与“新外交”理念相呼应。“新安全”观旨在超越传统狭窄的安全思维,谋求建立在相互合作及互惠基础上的“共同安全”。它认为,相互信赖是维持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的政治基础;安全不单依赖于军事手段或联盟,还依赖于相互信赖和共同利益。它还认为,不安全的来源不仅仅是国家之间不平等的物质分配,还来自国家所选择的实现安全的途径,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有关国家之间的沟通、协调及合作才能够实现。在“新外交”理念和“新安全”观指导下,中国采取了和平发展战略,旨在更加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谋求与其它国家“进行多边及建设性合作”,以解决存在与它们之间的争端和冲突。^[14]就东北亚地区主义而言,中国倡导该进程的开放性、宽容和互惠。换言之,它强调了三个方面:1)把发展作为核心主题并促进共同繁荣;2)构建睦邻关系,维护该地

区的和平与繁荣；3) 通过合作和协调实现互利互惠。

观念的变化促使中国重铸自我身份和行为调整。^[15] 在“新外交”理念和“新安全”观指导下，中国进一步重视发展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在中美关系方面，两国不断加强在安全政治领域的协调与合作。譬如，“9.11”事件发生后，中国迅速做出回应，对美国人民的不幸表示同情并谴责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过程中，中国更加积极地充当协调者角色。此外，中国开始重新评估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并以更为务实和理性的态度对待这种存在的作用。^[16] 人们逐渐理解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利益和传统影响，并将这种利益和影响的存在作为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一个可能因素。有关中美在亚太地区分享“重要的战略利益”以及两国应该“求同存异”的表述，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对外政策话语中。中国愿意“看到美国……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17] 一些研究者认为，“美国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公共产品’，……中国已经从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安排的‘现状’中受益，并有可能从中继续受益。”^[18] 这些理解表明，中国对于美国在亚洲（尤其东北亚）的军事存在，已经“从消极转变为至少是务实——如果说不是积极——的态度”。^[19]

与此同时，中国也相应调整与美国在东北亚盟友的关系，把加强与日本和韩国的双边关系作为推进东北亚地区主义进程的重要努力。中日两国互为重要邻国。在改善同日本的关系方面，中国倡导通过对话和沟通的方式解决它与日本之间存在的分歧，而不一定将它们放入日美联盟的框架下加以看待。有研究者观察到，在处理中日关系的棘手问题过程中，中国“悄悄地停止了对美日联盟的批评”。^[20] 如果以推动东北亚地区主义进程作为发展方向，那么，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将期待拥有平等地位，而且彼此尊重。因此，争夺地区主导地位和优势，既不应该受到鼓励，也不应该加以谋求。事实上，中日两国在地区合作中是“互补的”、可以“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寻求共赢”。^[21]

自1992年以来，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获得长足的发展”。^[22] 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削弱美韩军事联盟所造成的可能威慑。不过，韩国也不希望以牺牲它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作为代价。此外，由于中韩两国分享着二战时期的痛苦记忆，而且由于两国在地缘政治（譬如在处理朝鲜核问题）上的看法和认识趋于接近，中韩之间的安全合作正在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并致力于通过对话和沟通的方式处理它们之间存在的分歧。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面临着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困境。一方面，中国在外交理念和安全观方面发生重大调整，理解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和传统影响，改善与该地区美国盟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仍然不能确定的是，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主权行动方面，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尤其美日联盟——将意味着什么。

综上所述，本文探讨了东北亚地区主义进程如何为人们理解中美关系在安全政治领域的若干变化提供了一种语境化的背景。如果说21世纪的东北亚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那么，地区主义作为一种进程，可用来作为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的一种选择。一个得到日益认可的看法是，地区主义在东北亚应该呈开放式，并作为一种纽带把有待超越的国家层面和需要融入的全球层面连接起来。

第一，地区主义是一种社会、文化及政治建构的过程。它也是一种实践、一种思维方式，乃至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说冷战结束以来地区主义在东北亚成为一种可想象、可期待的事情，那么，该地区在21世纪所处的历史及现实环境，使得这一进程在安全政治领域变得既令人鼓舞，也步履艰难。

第二,作为东北亚地区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亚安全地区主义进程面临着更为棘手、而且根深蒂固的“软”难题。在东北亚,经济地区主义在短期内不会自动地带来安全地区主义的实现。二者之间的联系似乎并不像人们在其它地方(譬如欧洲)所看到的情形那样密切。东北亚各国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意义上安全困境的缠绕。就目前而言,东北亚安全地区主义和传统安全合作模式(即双边军事联盟),均用于作为确保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工具。不过,从长期看,东北亚地区持久和平及稳定的基础,更有可能依赖于东北亚安全地区主义所倡导的开放性和多边性安全合作模式。

第三,中国更为主动地参与并推动东北亚地区主义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安全观念的变化决定着安全行为的调整。重新评估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以及由它所主导的安全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新外交”思维及“新安全”观所发挥的指导作用。理解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利益和传统影响,符合东北亚地区主义进程的开放性、包容性原则。如果东北亚地区主义进程(尤其在安全政治领域方面)得到不断推进,那么,美国在该地区所维持的双边联盟关系应该逐渐淡化和削弱。

注释:

[1] 冷战结束以来,“地区主义”概念再度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在中国,东北亚地区主义通常作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而加以讨论,相关的研究日益增多,本文仅列举近年来与安全政治有关的一些成果。参阅庞中英:“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4期;王帆:“东亚安全模式:共存、并行还是置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张铁军:“中国与东亚共同体建构”,载《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2期;王毅:“思考二十一世纪的新亚洲主义”,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3期;孙学峰、陈寒溪:“中国地区主义政策的战略效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5期;薛晓芄:“中国对东亚地区主义观念的转变”,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3期;孙霞:“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挑战与路径选择”,载《国际资料信息》2006年第7期;苏浩:“东亚开放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朱宁:“东亚安全合作的三种模式——联盟安全、合作安全及协治安全的比较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任晶晶:“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东亚地区合作外交”,载《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1期,等等。

[2] 参阅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Gilbert Rozman,“Introduction,”in Charles K. Armstrong, Gilbert Rozman, Samuel S. Kim and Stephen Kotkin eds., *Korea at the Center: Dynamics of Regionalism in Northeast Asia*, Armonk: M.E. Sharpe, 2006, p.x.

[3] Martin Griffiths and Terry O'Callagh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273.

[4] 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7页;孙学峰、陈寒溪:“中国地区主义政策的战略效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5期。

[5] 苏浩:“东亚开放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44页。

[6] Martin Griffiths and Terry O'Callagh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Key Concepts*, pp.273-274.

[7] 参阅阎学通:“东亚和平的基础”,载阎学通、金德湘主编:《东亚和平与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页。

[8] 譬如(韩日之间)独岛问题、(中日之间)钓鱼岛问题、(俄日之间)北方四岛问题、(韩朝之间)黄海北限制线问题、(有关国家之间)南中国海问题等。

[9] Leszek Buszynski: *Asia Pacific Security: Values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2004, p.7.

[10] Ibid.

[11] Ibid., p.143.

[12] 陈寒溪:“东亚的合作安全”,载阎学通、金德湘主编:《东亚和平与安全》,第366页;Victor D. Cha,“Shaping Change and Cultivating Ideas in the US-ROK Alliance”,in Michael H. Armacost and Daniel I. Okimoto eds., *The Futurer of America's Alliances in Northeast Asia*, Stanford: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2004, pp.112-131.

[13] 中国重视对美关系, 希望与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参阅“江泽民同克林顿会晤”, 载《人民日报》1996年11月25日; 1997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重申, 在中美三个公报的基础上加强双边关系; 双方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参阅“中美发表联合公报”, 载《人民日报》1997年10月31日。

[14]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年版, 第594-600页。

[15] 有研究者观察到, 中国的身份和行为更加注重朝着以下方向转变: 1) 通过接受公认的国际规范和原则, 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2) 将自身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 反对任何旨在破坏该体系的做法; 3) 致力于同东北亚各国建立良好的相互依赖关系; 4) 与其它国家积极合作, 稳定与大国的关系; 5) 实施建设性的长期发展战略, 以促进地区繁荣。参阅 Jing Huang, “China and America’s Northeast Asian Alliances: Approaches, Politics, and Dilemmas”, in Michael H. Armacost and Daniel I. Okimoto eds., *The Future of America’s Alliances in Northeast Asian*, p.239.

[16] 长期以来, 中国对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抱以警惕, 认为美国的战略指向是对中国加以威慑, 并以它在该地区的军事联盟(尤其美日联盟)作为这种威慑的工具。中国一直将自己的安全努力放在抗衡美国的这种威慑, 谋求打破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所构成的可能封锁。

[17] 王毅:“思考二十一世纪的新亚洲主义”, 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3期, 第7页。

[18] 牛军、蓝建学:“中美关系与东亚和平”, 载阎学通、金德湘:《东亚和平与安全》, 第61-62页。

[19] Jing Huang, “China and America’s Northeast Asian Alliances: Approaches, Politics, and Dilemmas”, in Michael H. Armacost and Daniel I. Okimoto eds., *The Future of America’s Alliances in Northeast Asian*, p.242.

[20] Ibid.

[21] 王毅:“亚洲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 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1期, 第59页。

[22] 杨丹志:“中韩关系需要继承与超越”, 载《瞭望》2007年第15期, 第52页。

(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博士, 上海, 200433)

收稿日期: 2008年3月

(上接14页)

注释:

[1] 伍贻康:《区域整合体制创新》,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222页。

[2] 参见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8年版, 第33-35页。

[3] 杜布瓦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认为只有扩大王权, 彻底改革法国的教育、法律和行政, 法国才能获得国内和平; 只有建立一种类似国际联盟的、由法国国王领导的组织, 欧洲才能有和平。参见《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年版, 第502页。

[4] [美] 亨利·基辛格著, 顾淑馨译:《大外交》,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2年版, 第72页。

[5] Saint-Pierre, *Projet pour rendre la paix perpétuelle en Europe*, Librairie Thomas-Scheler, 1713.

[6] Saint-Pierre, *Mémoires pour rendre la paix perpétuelle en Europe*, 1713.

[7] Jean-Jacques Rousseau, *Jugement sur le Projet de la paix perpétuelle*, 1761.

[8] 王觉非:《欧洲历史大辞典》(上),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792页。

[9] [法] 卢梭著, 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 第30页。

[10] [法] 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年版, 第93页。

[11] [法] 让·莫内:《欧洲之父——让·莫内回忆录》, 成都出版社, 1992年版。

[12] [德] 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1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375页。

[13] 周荣耀:《戴高乐评传》,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4年版, 第2页。

[14] [法] 夏尔·戴高乐著, 陈焕章译:《战争回忆录》(第1卷),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页。

(作者简介: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博士, 上海, 200083)

收稿日期: 2008年3月